

中国“类比”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

卢 芸 蓉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文章根据中国逻辑史的发展线索,系统梳理了中国“类比”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先秦时期为类比研究的热潮期;秦汉魏晋六朝时期为类比研究的退潮期;唐宋至明清时期为类比研究的低潮期;近代为类比研究的理论探索期;现当代为类比研究的理论建构期。

[关键词] 类比; 类比推理; 发展历程; 逻辑

[中图分类号] B8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2-0019-03

自古以来人们在论辩中就能朴素地运用到“类比”,后来人们为了更好地论证自己的观点或反驳别人的观点,提出了“类”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类比推理”的理论。本文根据中国逻辑史的发展线索(采用汪奠基先生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对中国逻辑史发展的分期,即先秦时期、秦汉至魏晋六朝时期、唐宋至明清时期、近代以及现当代),简要概括各时期类比问题研究现状,梳理出中国类比问题研究的脉络。

一 先秦时期——类比研究的热潮期

先秦时期,辩风盛行,诸子百家尽力向统治者宣传自己的思想,并想战胜对手,要达到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辩者的口才及其辩论技巧,此时各种逻辑方法在辩论中应运而生。在这个时期中国逻辑思想还处于发端时期,对推理的性质和作用只是作一般的思考,还没有进入到理论的提升期,但已经出现了类比思想的萌芽,我们从《论语》中找到证据: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这里的“能近取譬”是指“根据人我同类(本性相同)以及自己好恶,可以推知他人的好恶”。汪奠基先生认为:“所谓‘取譬’的简单方式,就是采用直观形象化的说明,或者叫做广义的类比法。”^{[1]129}《论语·述而》中还记载了“举一隅以反三隅”,《论语·公冶长》中记载的“闻一知二”、“闻一知十”的类似看法。

除了孔子之外,诸子都很重视“类比”的作用,并在言论或著述中自觉运用类比,一时间形成类比研究和运用的热潮。

惠施非常重视类比推理的说明作用,他认为譬的作用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说苑》)当然,

“譬”在孔子和惠施的运用中,是包含比喻的成分在内的。孔子和惠施都自觉地运用了类比来说明问题,但他们都没有涉及到推理的基础——“类”理论。

和孔子、惠施一样,墨翟同样没有给出“类”的具体定义,但他提出“知类”、“察类”等思想。在《墨子·公输》中有关墨子“止楚攻宋”的记载,从墨子对“攻”与“诛”、“杀少”与“杀众”的分析来看,墨子的“类”是有着本质属性的含义。陈孟麟认为“墨子……指出了类概念不能是事物外部联系、偶然联系的反映,而必须是本质属性的把握。”^[2]墨子还在其论证中运用了大量的类比,并且总结出一种归谬式类比推理,即“明于小而不明于大”(或“知小物而不知大物”)。墨子的归谬式类比推理的出现,则使类比的形式多样化了。

孟轲反对墨子的思想,却不知不觉地吸收了墨子的“类”理论。他认识到客观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着差别:“夫物之不齐(‘齐’训‘同’),物之情也(‘情’训‘实’)”。(《孟子·滕文公上》)他也认识到事物之间有着同一性,并以类概念加以概括:“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孟子·告子上》)这里孟子“类”的定义是明确的。在认识到“类”的基础上,孟子在其论说中运用了大量的譬式推理,据统计在《孟子》一书中运用譬式推理达到了六十多次。在《告子下》中孟轲回答屋庐子话中的“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可以说是总结了类比推理的规则:“类比的性质应该是本质的,类比的过程应该取同一标准。”^[3]孟子在其论证中还运用了很多的归谬式类比推理。

荀子也是在“类”的基础上运用类比推理的。荀子的“类”不但有本质属性的含义,而且他还认识到物类关系的

[收稿日期] 2010-12-14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社科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0C1298)

[作者简介] 卢芸蓉(1974-),女,安徽无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生。

确定性:“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荀子·解蔽》)同时荀子也认识到了物类关系的相对性:“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荀子·正名》)在荀子那里,他把“类”提升到一个能区别人的高度,即一个人是“圣人”、“大儒”还是“役夫”主要是看他的论辩或思想是“有类”还是“无类”:“其言有类……是大儒之稽也。”(《荀子·儒效》)“多言而类,圣人也。”(《荀子·大略》)“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是役夫之知也。”(《荀子·性恶》)对类有了深刻的认识后,荀子说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荀子·非相》)“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这里还是在同类的基础上所作的类推。荀子也非常重视类推方法,他说:“谈说之术”,“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非相》)。

《墨经》可以说是对“春秋战国以来逻辑学说的科学总结”^[3]。在《墨经》中,墨家的逻辑学者对类推推理不但从理论上予以总结,而且还从形式、规则上予以充分说明。《墨经》主要是对“说”的形式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其所列举的七种“说”的方式中,就有“譬”、“侔”、“援”、“推”四种属于类推推理的。在《小取》中,还提出类推推理的具有规则意义的一般要求:“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将先秦时期类推研究推上了一个高峰。

二 秦汉至魏晋六朝时期——类推研究退潮期

秦统一中国后,以法为教,实行文化专制,墨学也由此受到摧残。但在秦汉时期,在“推类”方面有几本著作很值得注意,它们就是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子》和王充的《论衡》。

《吕氏春秋》中提出了“类固相召”和“类固不必可推知也”这两个命题。《应同》篇说:“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芥,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渔涸,则鱼龙不往;物之从同,不可为记。”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吕氏春秋》认为事物并不是因为只要是同类就可相推,还要考察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只有了解到事物产生的原因,才能推出可能发生的结果。在《别类》中还谈到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条件,并非一定能引起相同或相似的结果。这就是“类固不必可推知”。

《淮南子》中提出的“类可推而又不可必推”则是关于“推类”的原则,“类可推”是指客观事物都存在自然之类,因此在“知类”的基础上,根据“物类相动,本标相应”(《天文训》)的道理,具有类同关系的事物就可以进行推类;而由于事物的性质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而且由于有些事物看起来相近,但实际并非同类,这种情况既多也难以分

辨,因此“类不可必推”。

王充在《论衡》中提出“推类”必须与“验物”相结合。他指出如果物类不同,而去作推类,就会发生错误,特别是在借用其他事物作比喻进行推类时,更要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否则就是比类不当、引喻失义。虽然这些著作当中的“推类”并不就是类推推理,但它们当中对于“类”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类推推理结论的可靠性。

“秦汉以后便再没有专门的逻辑著作出现,形式逻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被取消了。”^[4]相应地,类推研究的热潮也消退了。

三 唐宋至明清时期——类推研究的低潮期

唐朝时期,由于印度因明的传入,大部分学者都倾心于因明学说的研究。因明有新、旧之分。古因明是辩论术、逻辑和认识论三者的结合。古因明的推论式是五分作法,又称五支作法。五支包括宗、因、喻、合、结。喻分为同喻和异喻。周云之先生认为“五支作法是类推推理,其结论是或然得出的。”^[5]陈那建立的新因明仅保留少量辩论术的内容,颜华东也认为“古因明的五支作法尚处在类推推理的阶段……。”^[6]

在宋明时期,学者们则注重“理学”(亦称“道学”)和“心学”的研究。宋朝时期的“理学”家们认为“万物皆是一理”,所以持一理可以“推通”天下的事物的道理。“理学”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一套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伦理范畴,对于“考详略,探异同”(《学案》十八)之类的具体工作他们都不感兴趣的。”^{[1] 327}

从唐朝的“因明学”、宋朝的“理学”和明朝的“心学”这些逻辑学主流思想可以看出,这段时期的逻辑与先秦时期的逻辑是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类推推理的理论在这段时间并没有得到发展,陷入低潮。

四 近代——类推研究的理论探索期

近代逻辑学研究有两个主流派别:一是西方传统逻辑的传入以及中国逻辑学的兴起,一是对中国逻辑史特别是对墨家逻辑的研究。这些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类推”问题研究,这个时期,类推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并探索了一些理论问题。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些先进的中国学者对逻辑学寄予厚望,因而把它引入国门,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两个人是严复和金岳霖。严复翻译了《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将逻辑归纳法和演绎法介绍到中国,他对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尤为重视;金岳霖则从数理逻辑是传统逻辑的补充、修正和发展这个角度来介绍国外的数理逻辑的研究。这个时期,对类推的一些看法是“含糊和混乱”的,处于理论探索时期,如石明著的《论理学常识》,何兆清著的《论理学大纲》以及林仲达著的《论理学》等都把类推推理的性质归为归纳推理的一种类型;再如吴俊升著的《新高中论理学》,朱章宝、冯品兰著的《论理学纲要》,伊荣绪著的《实用论理学》都用三段式来表示类推推理的形式。虽然这些著作对于类推推理的表述不甚明确,但也正是这些著作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些

重要的线索和材料,也体现了一种理论探索精神。

另外,随着西方逻辑学的大规模传入,也进一步推动学者们对中国古代逻辑以及类比思想的研究。如对《墨经》中的“说”的研究,包含了对“说”的各种形式如或、假、辟、援、侔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关于“辟”(譬),沈有鼎在他的《墨经的逻辑学》中把“辟”(譬)作类比推理解释,多数学者也都认为“援”和“推”是类比。随着对墨家逻辑的细致研究,类比问题研究又开始引起关注。

五 现当代——类比研究的理论建构期

经过前人细致的理论研究,到现当代,中国逻辑学界对类比以及类比推理研究进入到了理论建构的阶段,对类比理论中的关键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加强了应用领域类比问题的研究等,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类比理论研究体系。

关于类比定义的探讨。在我国高等学校的逻辑教材中,对于类比推理的定义有几十种之多,但都大同小异,大同在于它们都肯定了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有部分的属性相同,从而推出另一属性也相同,小异则在于对于共有属性的限定不同,有的把共有属性限定为相同,而有的则把共有属性限定为相同或相似。

关于类比推理表达格式的探讨。宏观上确认了三种类型:类型(I)是传统的类比推理的形式,其具体形式为:事物 A 有性质 $a\ b\ c\ d$ 事物 B 有性质 $a\ b\ c$ 所以,事物 B 有性质 d 该类型结论的可靠性依赖于两个事物所具有的相同属性的多少以及相同属性与推出属性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类型(II)是中国古代的类比推理的形式,其具体形式为:事物 A 和 B 同类,事物 A 有(或没有)性质 a 所以事物 B 也有(或没有)性质 a 这种类型的结论依赖于对于事物“类”的认识以及怎样去划分“类”。类型(III)是应用于模拟方法当中的类比推理形式,其具体形式为:事物 A: $p(p1\wedge\ p2\wedge\ p3\wedge\ \dots\wedge\ pn) - q(q1\wedge\ q2\wedge\ q3\wedge\ \dots\wedge\ qn)$; 事物 B: $p(p1\wedge\ p2\wedge\ p3\wedge\ \dots\wedge\ pn)$; 所以,事物 B $q(q1\wedge\ q2\wedge\ q3\wedge\ \dots\wedge\ qn)$ 。

相比较而言,类型(III)的结论可靠性程度大于类型(I)和类型(II)。

对类比类型的探讨。从具体的类比应用来看,类比又可以分为很多种:因果类比、数学相似类比、模拟类比、对称类比、仿生类比、肯定类比、否定类比以及综合类比等等。

对类比推理的归属问题的探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类比推理是一种不同于演绎、归纳推理的独立的推理模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与演绎、归纳推理具有同样模式的一种推理。有的学者认为类比推理是一种演绎式推理,有的学者则认为类比推理是一种归纳式推理,还有少数学者认为类比推理是归纳和演绎的相继结合的一种推理,总之,类比推理不是一种独立的推理。

对应用领域类比问题的探讨。类比推理除了在传统的辩论中有重要的价值之外,在刑事侦查等领域有着重要的价值,近年来人们增强了这方面的研究,使类比问题研究向纵深处发展。

[参考文献]

[1] 汪奠基. 中国逻辑思想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2] 陈孟麟. 从类概念的发生发展看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萌芽和逻辑科学的建立[J]. 中国社会科学, 1985(4): 123-127.

[3] 孙中原. 中国逻辑史(先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64.

[4] 孔繁. 荀况逻辑思想述评[J]. 贵阳师院学报, 1980(2): 50-56.

[5] 周云之. 中国逻辑史[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277.

[6] 顾华东. 简论因明研究的现实意义[J]. 甘肃社会科学, 1993(3): 8-12.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tudy about Chinese “Analogy” Questions

LU Yun-ro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clu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gic,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tudy about Chinese "analogy" questions. pre-Q in period is the boom period of the study about analogy. Q in Han Dynasties is the ebb tide period. Song to Qing Dynasties is the low tide period. Modern period is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ime. Contemporary period is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time for analogy study.

Key words analogy; analogical reasoning; development process; logic